



小莽苍苍斋藏

清代学者书札

上

顾问／曾立曾自
主编／陈烈
副主编／陈庆庆 陈啸

谿上梅花澹晚烟
花香长拂簾
吟笺青白咽微

移動靜好教當軸
恬炎涼偏要別人知
最憐茶渴詩成後
招引微颺入坐宜
詠風車一首錄倩
梅谿先生吟壇教和
春田弟汪為霖初稟
嘉蓮室

國家清史纂修工程
人民文學出版社





小莽苍苍斋藏

清代学者书札

上



顾问 曾立曾
主编 陈烈
副主编 陈庆庆 陈啸
释文 周铮
撰稿 陈庆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陈烈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47-6

I. ①小… II. ①陈… III. ①文化—名人—书信集—中国—清代②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K825.4②J2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852号

责任编辑 周绚隆 胡文骏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千字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74.75 插页4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47-6

定 价 680.00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田家英



父亲田家英的清史缘

曾 自

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这本图录集纳的是他生前所藏清代学者的书札。在此之前，已出版过两部图集，收录的是清代学人书写的楹联、卷轴、册页、扇面等。故这三部书可系统称为『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

父亲原名曾正昌，生于一九二二年，故于一九六六年，四川成都人。十六岁赴延安参加革命，二十六岁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参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的编辑工作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是毛泽东身边名副其实的『秀才』。

然而，人们虽都知道田家英的学养好，曾深得毛泽东器重，却很少了解他在紧张工作之余，坚持收集清代学者墨迹，集腋成裘，积累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

本文想就父亲辑藏这批清人墨迹的缘起，收集的经过，以及收藏的终极目的，谈谈我作为女儿所知道的往事。

走进清史研究大门的引路人

父亲三岁丧父，九岁失母，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败落。他十二岁辍学当学徒，十五岁靠稿酬收入独立生活，考上了中学。然仅上了一年，就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校方开除。算下来，他在校学习的时间总共不过六年。他



的学识，主要是自学得来的。

少年时代，父亲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十二岁起发表文章，赴延安前，他已在成都的报刊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杂文、散文和小说。自学的经历，使他逐渐对中国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三七年父亲来到延安，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他的好学和钻研精神，是与之相熟的人所公认的。到延安仅三年，父亲便担任了马列学院中国近代史教员。为讲好课，他通宵达旦地攻读史学著作，对中国历史的钟爱，成为了他一生的兴趣所在。

在延安，父亲有幸结识了著名学者范文澜。范老一九四〇年来延安，受聘于马列学院，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副院长，是时，父亲正在该院担任教员。

范老到延安后，边搞教育边撰写中国通史，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部书，可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始创之作。《中国近代史》一书，以鸦片战争以来各时期的主要矛盾为基础，配合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帝国主义、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

范老通晓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父亲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师，常向他求教。范老的学术成果、研究方法，无不对父亲的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父亲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仍对史学研究兴致不减，和范老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长期相处中，范老也很喜欢父亲，对这个聪颖有志向的后生希望甚殷。范老告诫父亲，研究历史要做到：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项缺一不可。范老的治学经验，令父亲受用一生。

还是在延安政研室，父亲从杨家岭中央图书馆借到一部萧一山著于三十年代《清代通史》，很感兴趣。他佩服作者的治学精神和勇气。但毕竟该书受时代和条件的局限，缺乏新的史料和新的方法，加之作者守旧的史学观，



给这部著作留下很大的缺憾。自从看到萧一山的书，父亲便萌生了一个志向：有生之年，要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

父亲从钟爱史学、关注中国近现代史，到逐渐明确了研究方向，可以说，都是范老指引的结果。直到进了北京，每有问题，父亲仍不断求教范老，并把范老回复的信件作为珍贵的手迹珍藏。

『毛泽东是我的恩师』

父亲热爱清史研究，还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那就是毛泽东。

建国后，父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好学，勤奋，爱思索，遇事有自己的鲜明观点，受到毛泽东的喜爱和器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几乎每晚都叫父亲过去，交办工作后，两人便谈古论今地聊起来。从历史、古典文学到古今人物，无话不谈。

毛泽东酷爱读书，也喜欢爱读书的人。他曾开玩笑地与父亲戏言：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说完开怀大笑。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居高远望的襟怀和抱负，无疑给父亲以巨大的影响。父亲曾感慨地对友人说：『主席不仅是领袖，也是我的恩师。』

父亲喜欢研究问题。他对中国现代史、党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都下了大功夫去研究。《清史》也是他关注的课题之一。

如果说，父亲对清史的研究，最初只是始于个人兴趣，那么建国后，他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则是在不断思考后，作出的理性选择。母亲董边有一段回忆很能说明问题：『五十年代初，一次我和家英去古旧书店，路上聊治学，家英说：他认为清代是封建社会有代表性的朝代，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之大成。研究它，对于认识封建社会的弊端和社会发展形态的规律有现实意义。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到社会主义社会，不研究中国的过去，不研究封建社



会的特质，是搞不好的。现在条件比延安时好多了，早有写一部清史的想法，只是工作太忙，不能集中精力。但可以先收集资料，为日后的写作做准备。他告诉我，这个想法和认识曾和主席谈过，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特色鲜明的专项收藏

建国初，父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毛泽东建立个人图书室，去各类书店淘书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乐趣所在。在古旧书店，父亲见距今年代较近的清人法书作品俯拾即是，很少受人重视，他便决心大量收集它们，以供自己研究之用。

父亲对清代学者墨迹的收集，大概始于五十年代中。十几年间，他把绝大部分工资、稿费都用在这件事上。北京琉璃厂文物店，西单、王府井的古旧书店是父亲收获最多的地方；父亲的另一渠道，是利用和主席外出开会、调查的机会，跑遍了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地的文物商店。由于常去常往，他和地方上许多行家结成朋友。他的收藏之举，也得到众友人的热诚帮助。例如，一次父亲在杭州开会，听说古旧书店有海宁某藏书家后人卖出的二千多封清人信简，便马上同店方联系，利用工作间隙，一周内把这上千封书札过目了一遍。为了弄清这批信札的内容及价值，他将其借回来，摊在下榻宾馆的地板上经过对比琢磨，最后买下了四十封。

父亲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本萧一山编的《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原本泛黄的书因长期翻阅，更显老旧。此书可以说是父亲选择藏品的『航向标』。凡收到一件作品，就在该书所述此人前画一红圈。他对朋友戏言：此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他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一千多位学者的墨迹，尽可能收全。

父亲注重收集文人、学者、官吏的墨迹，他看重的是这些墨迹的史料价值。所收品类，有条幅、楹联、册页、书简等。其中史料价值较高的应属信札，共收了三百余人的近六百通信。

父亲多年养成夜晚办公的习惯，工作前，总要拿出一小时，对藏品整理考证，研究欣赏，一日不看，便会觉得



缺失了些什么。

他把相关的信札，按内容汇编成集。赵翼等十一位学者写给孙星衍的信，合为《平津馆同人尺牍》；钱大昕、翁方纲等给钱泳的信，合为《梅华溪溪同人手札》；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信也被合成一册，注上了「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的字样。这些信册都选用深蓝色布面装裱，分类题签。

父亲为收藏之事治印数枚，计有「家英辑藏清儒翰墨记」、「家英所藏清代学者墨迹」、「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等，工工整整地钤盖在最喜爱的藏品上。

父亲的收藏之举，得到很多友人的理解和支持。谷牧、胡绳、魏文伯、李一氓、辛冠杰、姚洛、王力等，或把自己所藏赠送父亲；或帮他寻找；或以交换藏品的方式弥补缺项。收藏鉴赏大家辛冠杰曾说，当年收藏文物的老同志不少，但专项收藏目的明确的，只家英一人。

蔚为大观

到一九六六年，父亲的藏品已达千餘件。年代从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跨越三百餘年，涉及人物五百餘人。

明末清初的著名人物中，先后收有傅山、朱耷、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周亮工、吴伟业、龚鼎孳、魏裔介、李光地、万寿祺、徐乾学、朱彝尊、李渔、孔尚任等的各类墨迹。

父亲最下功夫，兴趣最浓的，是清中期乾隆、嘉庆时人物的手迹。其中以师法汉儒的「乾嘉学派」和与之对立、提倡宋明理学的「桐城派」代表人物的作品，收集得最多且质量最好。「乾嘉学派」领军人物惠栋、戴震，「桐城派」鼻祖方苞、姚鼐、刘大櫆，他们的墨迹都收到了。这一时期，还有扬州八怪、西泠八家的作品，也很精彩。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阶段，父亲更多关注时代风云造就的杰出人物。如思想家、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父亲收有他的一幅中堂，视为珍品。友人来，必拿出欣赏。可惜这件珍品，「文革」



期间被陈伯达拿走散失了。

再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墨迹，父亲收得较多。他仰慕林公人品，其条幅、楹联收有若干。其中《观操守》中堂，是林遭贬黜后所作，『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要在被考验的环境中才体现得最真切。可以说，这幅墨宝是林则徐情操的写照，对研究林的晚年生平思想，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父亲还收有『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四人的墨迹。其中谭嗣同的扇面和康广仁的楹联最为难得。谭嗣同英年早逝，墨迹传世极少。父亲仅得其一幅扇面，书体行隶兼有，秀美中透着刚劲，独具风格。父亲十分敬重谭嗣同舍生取义的气节，欣赏时会情不自禁地吟咏谭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甚至将谭的斋名『莽苍苍斋』，前面冠一『小』字，用于自己的书斋名，以表达对这位爱国义士的敬仰。

收藏带给父亲精神世界的安慰

曾和父亲一起工作了十七年的逢先知主任说过：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逢主任的话是有所指的。

『文革』之初，父亲不堪忍受诬陷，成为这场浩劫最早的受难者。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面对左的指导思想，父亲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一九六二年，他被指责为刮『单干风』的代表人物，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这一年，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可想父亲的思想是多么的苦闷。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在以后倍受冷落的日子，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清人墨迹的辑藏中。这个爱好，给了他精神世界以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文化性格，体现在他的收藏中；同时，收藏活动也陶冶着他的情操。

一九六一年，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被动局面，他受毛泽东委托，带队到浙江农村调研。当他目睹了老百姓因缺粮断炊，或逃荒或病饿致死的惨景，心情沉痛。闲来时，他向共同调查的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背诵了清人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感慨道：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百姓疾苦，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就在这次调查中，他向工作组同志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怕受打击。人生最惨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一定向毛主席反映。』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实正派的品行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调查回来，父亲请人将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刻成对章，视为座右铭。他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躲避或追求其他。』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离他去世仅两月前，他还邀知友刻了『忘我』和『无我有为斋』两方印章，以寄托自己愿为国家人民的利益献出一切的决心。

面对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父亲和母亲说过：『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爱国志士『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无关联。

怀念和继承

父亲虽然早早离开了，但几十年来，在整理编辑他的藏品的过程中，我们却不断加深了对他的学养品行的认识，这意外的收获，至为宝贵。



小莽苍苍斋藏

清代学者书札

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对劫后幸存的『田家英收藏』进行了鉴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说：过去知道家英同志收藏清人墨迹，以为只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收集得如此齐全成系统。以往国家博物馆多把征集的注意力放在年代久远的文物上，对清代文人学者的墨迹不够重视。家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的眼光早了我们整整三十年。

一九九一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小莽苍苍斋收藏清代学者法书展』，引发了人们对父亲的怀念。赵朴初老人观后即兴题写了『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的诗句，对父亲的收藏意义和人品人格表达了仰慕和尊敬。

展览结束后，母亲即将一百零五件藏品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清代著名人物的墨迹。母亲在展览开幕式上说：『家英为研究清史而收藏，也是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收藏。他当年说过，这些藏品是人民的，将来应让它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挥作用。』我们全家用实际行动，完成了父亲的承诺。

之后，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上下编，字轴、楹联尽收其中，展现了其收藏全貌。虽然父亲撰写清史的初衷未能实现，但我们承继了小莽苍苍斋的事业，努力将个人收藏公布于世，使之流布人间，努力实现父亲的夙愿。

今天，父亲倾心辑藏的一批清代学者信札，终于全部出版了。大气的设计和精美的印制，更增其彩，为业内学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和欣赏的机会。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将之视为对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最好的怀念。

壬辰年于毛家湾寓所



翰札集萃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评述

陈庆庆

书札，又称尺牍，是我国古代人们互致问候、传递信息、沟通情感的媒介。这种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流，无隐讳，少虚饰，发自肺腑，直抒胸臆，是作者思想、行为初始状态的记录，从中可以窥见官方文牍和公开诗文中难以看到的隐秘。因此，书札往往成为我们考史、证史借以征信的资料。

文人学者间交往的书信，其价值不同于一般书札：首先在于它的学术价值。学者间书雁互传，谈及的大多属于学术问题，他们或有疑义相析，或以所得相告，或缕述搜集材料之艰，或细陈考订核实之苦，许多学者书札将学术与书信融为一体，堪称一篇篇短小精悍的学术论文。其次在于它的史料价值。学者书札所涉小则生老病死、节令馈赠、民俗民风，大则朋党纷争、干戈离乱、社会变革，既有学者生活方式和心理活动的描述，又有社会矛盾和国家兴衰的记录，为我们认识古代文人和社会状况提供了珍贵直接的史料。再次在于它的审美价值。由于学者多为当时著名书家，且尺牍书写是自然状态的流露，因此往往最能反映书家的真正水准，多有佳作。再加上典雅的文辞、讲究的格式、精美的信笺，使得学者书札处处渗透出文人的修养和气质，展现了他们的翰墨风采。

『小莽苍苍斋』以专藏清代学者墨迹著称。斋主出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写一部新清史』的目的，尤其注重寻觅文人书札。至十年浩劫前夕，已入藏清人信札六百餘通，涉及清代学者、书家、官员、文士三百餘家。这



批藏品的时限，上溯至清康熙五年，下止于民国初期，跨越二百五十余年之久。内容涉及对国事吏治的评议，艰难生活的记载，文人交往的描述，学术探究、典籍整理、修志续谱、雕版印书等等的讨论。其深厚的内涵，集中体现了斋主的收藏初衷，是『小莽苍苍斋』藏品中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最为丰富的一部分。

总结学者学术成果、记录学者学术活动、反映学者治学态度，是『小莽苍苍斋』藏札的一大特色。

清代初期，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对明清易代的时代巨变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向数百年来在学术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提出挑战，重整汉代经学。至乾、嘉之际，以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得以大兴，一批博古通今的大家由此产生。学者们普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目录、版本的研究，以经学为中心，旁及小学、史学、金石、地理、天文、历算及诸子百家，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①。因此，探讨切磋、辨析解疑、抄残补缺之类的论学书札，在这一时期大批出现。『小莽苍苍斋』就收藏有清乾嘉时期吴派钱大昕、赵翼、王昶、洪亮吉、孙星衍，皖派金榜、阮元、王念孙、任大椿、卢文弨等学者的论学书札。斋主在收藏这些书札的同时，还进行了整理和考证。如将赵翼、王念孙、章学诚、汪辉祖、武亿、江声、洪亮吉等十一人写给孙星衍的书札合为一集，订为《平津馆同人尺牘》；把钱大昕、翁方纲、彭绍升、阮元、梁章钜、石韞玉等十九人写给钱泳的信汇聚一册，题名《梅华溪同人手札》；对于零散的学者书札，则根据内容以时间为序，分为甲、乙、丙、丁四编和文苑上、下两个附编。展阅这些书札，我们仿佛置身那个时代，感受到清儒翰墨之气。

在『小莽苍苍斋』所藏论学书札中，学者们常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相互告知。

江声在致孙星衍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研究『明堂之制』的过程。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地方。自



小莽苍苍斋藏

清代学者书札

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对于『明堂之制』皆有所研究。至清代，对于『明堂之制』的考证更是形成了一股风气。毛奇龄的《明堂问》、惠栋的《明堂大道录》、戴震的《考工记图》、孙星衍的《明堂考》，均是清人对于『明堂之制』研究的代表作。江声是著名经学家惠栋的弟子，他潜心经术，深谙考据之学。江声在信中首先比较了其先师《明堂大道录》与孙星衍《明堂考》的优劣，接着便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盛德篇》记载为据，推算出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就一面而言，非四面也』。这通信为了解清人『明堂之制』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汪辉祖在致孙星衍的信中记述了自己在史学领域取得的成果。『辉祖少孤失学，衣食于佐幕者三十年』，『壹志读史』，他认识到索引和其他工具书对于便利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先后编订了《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录》、《二十四史同姓名录》、《辽金元三史同名录》等史学工具书，还编撰了《元史本证》，为《元史》纠谬拾遗。汪辉祖在这通信中不仅谈及了自己的学术著作，而且提到了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邵晋涵、洪亮吉等人，展示了他们的学术交游情况。此信由汪辉祖口授，儿子汪继培代笔。汪继培学问不在其父之下，父子合书也为该札增添了几分色彩。还有李富孙在致冯登府的信中畅谈自己读书的收获。李富孙在获赠王念孙《读书杂志》十种后，详加研读，认为此书『考核精详，补脱正讹，有卢、段诸家所未及，即钱氏超辰之说亦并驳之』。李富孙学有原本，精经史金石之学，著述颇丰。他对王氏校勘训诂名著的评价，尤为贴切。

学者们对于著作的摘瑕指谬，也是『小莽苍苍斋』所藏论学书札的重要内容。

徐松致张澍的信阐述了《西夏姓氏录》的几点不足。徐松和张澍均为清代治西夏史的代表学者。徐松看到张澍寄示的《西夏姓氏录》后，感到『欢喜无量』，认为『搜辑颇不为易』。同时他提出『《旧唐书》载羌姓……均宜补入』，『至文字异同……只应增注以省重出』，以及蕃汉区分等问题供张澍参考。《西夏姓氏录》是清代西夏姓氏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书『依据本史，兼系当时人之著述，稍有增益』^①，因而难免存在舛误。徐松此信颇具补阙纠谬之功。

李黼平致信梁廷枏，谈及梁氏的《论语古解》，称『此书出，诚足资学者编摩。披阅再三，似尚有未尽』。《论语古解》



为梁廷枏摘取由汉至唐三十馀家与朱熹《论语集注》相异之说，依次编排而成的著作。李黻平在信中论述了梁廷枏在摘引诸家注疏时存在的问题：『如但取皇侃所不敢知，若求其与《集注》别者，即何氏《集解》中亦不止此。又如《礼疏》引郑《论语》「过位」注云：「入门右北面，君揖之位。」可证是臣位非君位。《诗疏》引「东周」注云：「据时东周。」可证「周」之非「鲁」。《文选》注引郑「山梁」注云：「见一雌雉，食其梁粟。」可证「梁」之为「梁」。』史家评价梁氏《古解》，为朱氏《集注》对照注本，更补《集注》名物训诂之粗，具有辑佚、钩沉之效。李、梁二人同受聘于汉学家阮元创建的学海堂，专授诸经史训诂。李黻平为好友披阅摘瑕，足见其治学之精。

梁上国在致友人的信中反驳了毛奇龄的名著《大学证文》。毛奇龄是清乾嘉考据学的先导，其《大学证文》一书不仅详辨了诸家《大学》改本的异同，而且考证了各种改本的源流。而晚于毛奇龄一百二十馀年出生的学者梁上国，却大胆地指出了前辈学者著述的种种不足之处。梁上国在信中称：『毛氏本胜朝遗士，获举鸿词，急思并长于当代，故其为书务掎击前儒，而于有名之朱子，掎击尤不遗余力，一片私心真肺肝如见矣！』他认为毛奇龄的著作『无一条可取，而其中显然欺诬者，如穷理本孔圣之言，而偏嗤为朱子之新说，『又朱子规劝友人之语，而诬指为朱子自悔之词』，『如此立说，黑无天日，真欺尽天下读书人，误尽天下读书人也』，『此书若颁布，必有大招物议者也』。梁上国精通经学，勤于著述。其著作《驳毛氏大学证文》，是对毛氏著作博而不精的详细驳正。

学者们在摘瑕指谬之后，还常常相互商榷，这些内容也多出现在『小莽苍苍斋』所藏论学书札中。

任大椿在致史蔺生的信中，生动地描绘了几位学者对文章得失的讨论。从信中可知，任大椿在阅读史蔺生所作《书薛兰州事》和《张白菴先生墓碣》两篇文章时，二云（即邵晋涵）和实斋（即章学诚）两位先生正好在座。实斋认为：史蔺生『文虽佳，吾却惜其过于文耳』。任大椿却认为：『不然！后世之所以不及古人者，正在文不及古人』；并称『实斋见解甚高，笔下正坐欠文耳』。邵晋涵和章学诚均为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信中所描述的对话，正是学者们对于先圣之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商榷。史书记载，章学诚眼识甚高，从不轻易赞



小莽苍苍斋藏

清代学者书札

许他人，从这通信中也可可见一斑。

在『小莽苍苍斋』所藏论学书札中，学者们还常常提及治学的不易和收集材料的困难。

章学诚致信孙星衍，诉说了自己在武昌编写《湖北通志》的艰难。章学诚作为史学理论家，将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修志实践，创立了『三书』（志、掌故、文征）、『四体』（纪、谱、考、传）的方志新体例。梁启超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③然而其修志实践却极为不易。章学诚在信中写道：『鄙人楚游，前后五载，中间委曲，一言难尽。大约楚中官场恶薄，天下所无，而游士习气亦险诈相倾。』『上自抚藩，下至流外微员，标营末弁，莫不视为怪物，天下真是真非，谁与辨之？』他『以通志之役，羁留湖北，几致受楚人之钳。』『而逆苗扰扰，未得暇及文事，鄙人狼狽归家，两年坐食，困不可支。』并由此感叹：『古今绝大著述，非大学问不足攻之，非大福泽不足胜之，此中甘苦，非真解人不能知也。』

类似内容的藏札，还有邓显鹤致友人的信，他向朋友讲述了自己收集材料编写《武冈志》的艰辛。邓显鹤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文献学家，曾国藩称『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饮食，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全省之方輿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④。邓显鹤在信中写道：『武冈自汉以来为西南边徼一重镇，有明三百年，岷藩分封，仍世多故，至末造而永明播越，悍帅骄卒之蹂躏，荐臣谊士之流离致命。』自己在编写方志的过程中，『费苦心搜辑』，『得之佚闻，访之私乘，参之别记，证之国史，凡荒陬古寺残碑断碣，搜罗殆尽』。尽管如此，仍感不满，『惜为时太促，采访不周，又偏隅无多书可考，讹谬滋仍，深用惭愧，耿耿在抱』。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殉道士的精神，才使得《武冈志》『不循寻常方志体例，别出心裁，深得史家之良法美章，独具卓识，可称名著。』^⑤

这些论学书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学者们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就，成为后人研究乾嘉学派的重要史料。

学者藏书、校书、刻书是清代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刻书之多，超乎前代，而且考证校雠之学，至乾嘉而极盛，校刻之书，多精审可靠』^⑥。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人文渊薮，文化积淀深厚，加之物产丰盛，经济富足，具备了藏书、